

以文学见证民族发展的进程

——新时期侗族文学发展简况

□杨玉梅(侗族)

侗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作家创作基本上都是使用汉文。与民间文学悠久灿烂的历史相比,侗族作家文学发轫较晚,从目前史料来看大抵可以追溯到唐代,而且主要是诗歌。但是清代之前保留下来的作品寥寥无几,只有清代之后出现的诗人留下了一些诗作。侗族小说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开拓者是苗廷秀。

新中国成立后,苗廷秀、杨志一、柯原、滕树嵩、张作为、李鸣高、龙世辉、刘荣敏、袁仁琮、谭良洲等作家不断写出优秀之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侗族地区在改革中实现跨越性发展,侗族文学也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30多年来,侗族文学力量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作家构成的作家队伍。文学前辈走过坎坷岁月,到新时期笔耕不辍,将丰富的生活经历、深厚的文化积累与独特的思考诉诸笔端,创作出一大批内容厚重的优秀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熊飞、粟周熊、吴浩、张泽忠、黄松柏、刘芝凤、隆振彪、石干成、潘年英、蔡劲松、陆景川、吴桂贞、田均权、莫俊荣、杨曦等作家崛起,他们的作品饱含文学理想和民族情怀,不断创新求索,创作出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新世纪以来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如杨仕芳、陈守湖、龙章辉、杨钧特、吴基伟、杨林、雄黄、姚瑶、谢以科、姚文等,带着青春的锐气和文学的激情,为侗族文学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三代作家辛勤耕耘,在文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探索中不断开拓创新,共同推动着侗族文学的发展进步。虽然每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共性特征。

首先,新时期侗族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侗乡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

30多年来,在贫困中求发展一直都是侗族地区的时代主题。侗族作家书写了大量反映侗族地区社会变迁和发展进步的作品,展现了侗族人民走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波澜壮阔的新生活,许多作品都具有历史性的开拓意义。如滕树嵩的长篇小说《风满木楼》生动展示了解放前夕

黔东南清水江畔侗族地区大分裂大动荡的复杂斗争生活,反映了侗族人民寻求革命走向解放道路的艰难历程。滕树嵩说:“许多民族的作家早就完成了反映本民族斗争历史的任务,可我还花时间去填补空白。《风满木楼》这部长篇,就是为填补空白而写的。”张作为在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原林深处》,是侗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作品不是取材于侗族生活,而是表现云南哀牢山原林中苦聪人出山定居的艰难历程,也是开历史先河之作。龙月江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侗妹》真实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普通百姓及在京侗族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新时期初期,侗族作家张扬启蒙和理性的旗帜,批判封建思想和落后习俗,控诉“文革”的黑暗,反思历史,作家在新旧冲突中欢呼新时代的来临。如吴浩的《鬼妹》通过女主人公阿欢的坎坷人生表现侗族女性的命运悲剧,充满了启蒙意识。熊飞的《山葬》对长久存在的落后古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谭良洲的《高高的盘琴岭》充满了浓重的伤感意味。杨进恒的《人情债》生动描绘了侗乡摆脱贫穷走进新生活的欢喜面貌。进入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逐渐深入到民族地区。侗族作家敏锐发现生活的新动向,他们描写现代文明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冲击,表现底层百姓生存的困境。如潘年英的小说《连年家书》通过盘村弟弟妹妹的命运挣扎,展示了底层百姓从乡村进入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种种酸楚和无奈。20多年来,潘年英立足于精神的故乡盘村,创作了长篇小说《故乡信札》《木楼人家》《寂寞银河》等,通过乡村普通人物的生命形态反映侗乡社会生活变迁,反思现代化给侗乡带来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改变。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时代气息新时期侗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勃勃生机与发展活力。

第二,很多作家保持对民族性的自觉求索,作品充满浓郁的侗族文化特色,实现了文学自觉与文化自觉的统一。

新时期以来,侗族作家自觉关注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潜心从本民族悠久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变革现实中汲取艺术养分,表现侗乡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求索。如刘荣敏的《龙塘门客信》、袁仁琮的《朵约和普尼》、谭良洲的《侗乡》、张泽忠的《方太阳》、石干成的《五多趣事》、隆振彪的《白牛》、余达忠的《黄昏》等中短篇小说,石玉锡的《金桂》、杨仕芳的《故乡在别处》等长篇小说,杨曦的《寻找侗族大歌》、陆景川的《向世界敞开大门》等散文集,黄钟警的《我的侗乡》、雄黄的《岑庄》等诗集,都是关于侗乡社会生活的生动述说。他们满怀民族文化情怀,在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展示一种生命存在,一种人生境遇,塑造民族精神,传达作家对社会、对人生、对民族未来发展的深刻认识与思考。对民族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和积淀久远的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为侗族作家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第三,文学题材、主题日益丰富,在文学艺术上探索多向度发展。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学自身观念也在发展。侗族作家也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不断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自由度,文学思想观念充满着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学题材、主题思想的丰富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在侗族文学历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小说方面,侗族作家一方面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书写出一大批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和时

代变迁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又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久远的历史,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处中发掘创作的资源,多方面多角度地观察和反映生活。如袁仁琮的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通过王阳明的治学和从政经历,再现了明代中叶官僚政治的腐朽没落与社会的荒唐破败,展现了中国历代文人的命运沉浮与经国济世的抱负。长篇小说《血雨》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为时代背景,主要描绘了一心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回国后所遭受的囚禁生活及其精神折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成为革命的领导、中国为何选择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还有近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反映从解放初到“文革”结束期间贵州侗乡社会的发展变迁,既具有历史小说的深刻思考与总结回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深刻阐释了“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的道理。作者对现实和历史反映的广度和挖掘的深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独特地位。

再如蔡劲松,最初从诗歌创作步入文坛,20多年来坚持诗歌、散文与小说三管齐下,在文学中追忆故乡,探索生命的秘密,追求精神的高度。在小说集《亮是什么颜色的》中,他描绘了成长的复杂体验,既是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长篇小说《觅果者》以诗意的文笔讲述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困惑、婚姻的突围和事业的求索,饱含对生活的深刻思索和独特想象。此外,蔡劲松还创作了大量雕塑、油画、水墨画、摄影作品,“紧握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的银钥匙,让寻梦之路向远处延伸”。他在文学与艺术中自由穿行,实现了文学与艺术的交融共通,为文学艺术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

·创作谈·

路是走出来的

□袁仁琮(侗族)

事情,想不明白的道理。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关注的题材由边远农村(长篇小说《穷乡》)到城市(长篇小说《难得头顶一片天》),由现实生活到古代生活,由农民到领导干部、地下党(反映息烽集中营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血雨》),再到教师、中学生(长篇小说《太阳底下》),古代大思想家、哲学家(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庄周》《孔子》),以及别的生活和兄弟民族的人与事,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进入创作的时候,再也不用花大力气从民族风俗和民族习惯去猎奇,种种生动场面便很自然地脑海里涌现,各种各样鲜活的人物争相亮相。经过这样一番题材拓展,如今不再担心没有写的题材,而是精力有限,没法把我想写的内容全部写出来。

在拓宽创作路子的过程中,我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有过许多困惑。但我走出了狭窄的生活圈子,提高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自信力。再回头去看看我养我的那片天地,看看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感觉大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不再停留在民族生活的表面,而着力于社会生活的深层、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人物的精神世界去探索和表达,提高了作品的厚度和张力。

坚持为人民创作,是我的信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受过冲击,但始终向前看。我从理论学习中认识到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前进中必然出现种种失误和挫折。新中国虽然经历重重困难,但毕竟走过来了,而且越来越好,越走路越宽。我花9个月工夫写家乡的历史变迁,写成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感觉轻松愉快,这是我不断开拓创作题材、扩展艺术思维空间、提高理论水平水分的结果。

路是人走出来的,文学创作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没有什么诀窍,而是辛勤磨砺的结果。

盘村的虚构与纪实

□潘年英(侗族)

很多年了,我一直在写作“盘村”的故事。很多人明白,我的所谓“盘村”,真实的地名其实叫“盘村”。这村子属于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是一个只有80多户人家的小小侗族村寨,偏僻,偏远,至今依旧木楼簇拥,青山绿水。

盘村地处一道深深的高山峡谷之中,谷底有一条小河沟,雨季到来时会爆发山洪,有很大的流量。这条小河沟本来无名,但在我的作品中被命名为“盘江”。

盘村村坐落在峡谷里的一处平地上,四面环山,开门见山。顺着谷底的溪流,有一条小路连通着外面的世界。从前这小路是花街石板路,花街精致,石板坚实,至今仍残存。后来小路不断改道,渐渐就荒废了。2004年盘村村民自行修通了一条简易的公路,2014年这条简易公路又变成了水泥路。2015年天柱县通了高速公路,盘村村距离高速公路出口仅仅十来公里,其跟外界的交通方式至此彻底改变。

随着交通方式的改变,盘村村村民的生活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首先是职业的改变。本来,盘村人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种田,烧畲,完全依赖土地而生存。后来,沿着那条小路,有人走出去了,有当兵的,有读书的,还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从文墓前石碑上的这一名言,道出一个士兵铁定的宿命。从故园出发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游子内心最美的地方,一直都是自己的胞衣地——那里有自己全部的黄金、全部的记忆,是爱的始发地,也是爱的源泉。回到那里,故乡以宽厚的胸膛接纳,那是入心入骨、入髓的爱。

我的故乡,在湘西新晃一个古称“辰郎”的福地。我的侗族,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极具创造性的民族,趣味横生的侗家民俗,瞠目结舌的巫傩秘技,有目共睹的民间绝技,无不折射出侗族的异彩。我从小生于斯长于斯,再由此出发,在尘世间疲惫地行走。曾经,我也被俗世的成功学裹挟,心生浮躁。一度搁置诗歌,为了物质欲望拼命地追逐和狂欢。中途辍笔十余年间,内心一度空茫,不知身置何处。当我回炉到岳麓山下读研时,重找诗意,寻觅净土,重新开始诗生活。这是一种诗意的修复,以及来自灵魂的深度召唤。

有打工的,由此盘村的人有了不同职业的分化。然后,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了。从前的盘村,家家户户吃的都是大米,住的都是木楼,穿的都是家织的土布衣服,说的都是侗话,但今天的盘村,吃的当然还是大米,但许多人家的孩子已经习惯于用奶粉当早餐,住的变成了砖房,讲的是普通话,穿的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服装……一句话,大变了!

我很幸运生长在这样一个村寨,也很庆幸自己能成为这寨子生活变迁的观察者 and 记录者。时至今日,我为盘村村写下了两个“故乡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包括《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写的是我对盘村村的童年记忆,讲述的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然后又写了第二个“三部曲”,包括《解梦花》《破璃》《河畔老屋》,写的是我们这代人的故事——我们从盘村村走出去,在外面的世界里历经沧桑,然后又回到盘村村来疗养心灵……接下来,我还想写作一个新的“三部曲”,讲述的是盘村村下面面临的生存困境——年轻人外出打工,家中老人孤苦伶仃,中年人离异,村里全部的孩子被迫到城里读书,父母则被迫到城市里租房陪读……

没错,30多年了,我一直在观察我的故乡,也一直在写作我故乡的故事。只要还有精力,我还将继续这样的观察和写作。我对于故乡故事的讲述从来乐此不疲,因为除了写作,我再没别的爱好,除了故乡,我再没有更熟悉的生活。

返乡,或回望

□雄黄(侗族)

很显然,诗歌之于我,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是水银镜,照出我的俗套、我的卑微、我与时间的差距、与空间的隔膜。握笔写诗,就是要把爱喊回来。诗歌在改变我们的容颜和内心的温度。亲情、村庄、时光、大地、自然、万物、仁爱、感恩、开悟,都应该在诗歌本质的母题。诗歌阅读和写作,确实是一种瘾。我在诗歌里普度了自己,是诗歌让生活增加柔软,增添了呼吸的氧含量,让人重新获得新觉悟。

时至今日,尽管我的故乡仍然封闭、贫穷、落后、苦涩、孤立,但对于我而言,故乡总是那么魅力无限:吱吱嘎嘎的水车、辗转不停的碾坊、随时随地的山歌……当我踏上故

在诗歌方面,诗人将深厚的生活积累、丰富的思想情感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融为一体,精彩纷呈。如诗人杨志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创作了不少诗歌,自由诗、古体诗皆有。解放后,他创作了一系列歌颂新生活的作品。新时期以来,他广泛深入到侗族地区,写下了大量侗乡题材的古体诗,表达侗家拳拳赤子的民族深情。军旅诗人柯原坚持文学创作60多年,创作了许多反映军旅生活、歌颂新时代的诗歌,如《露营曲》《一把炒面一把雪》《岭南红桃歌》《椰寨歌》《浪花岛》等,极大地丰富了侗族诗歌的审美内涵。黄钟警的《歌的家乡》、黄松柏的《侗箫》、姚瑶的《回望与坚守》、雄黄的《烟农记》等诗作,充满了浓郁的诗情与民族文化韵味,诗意悠长。吴基伟的长诗《大观仰止》歌颂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的爱国情与中国心,体现了侗族诗人的家国情怀。

散文形式自由,内容丰富,不拘一格。如粟周熊的散文集《心缩丝路》生动描绘了作者旅居哈萨克斯坦时的所见所思,充满了独特的异域文化特色。陆景川的纪实散文《龙大道传》真实再现了革命英雄人物龙大道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历程,是少数民族纪实文学的重要收获。杨曦的长篇散文《寻访侗族大歌》真实再现了充满原生态文化魅力的侗寨人文风情,是关于民族文化记忆的生动写照。陈守湖的《草木书》从自然草木中解读人生解读生命,独具匠心。张作为的《漫漫长路》和杨韵的《心中延伸的一路冰雪》以作者走出大山的坎坷人生历程,折射出一个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发展进步的历程。龙章辉的散文集《好像听见父亲在风中说话》以充满童稚的清新文笔书写乡村记忆,抒发人生感悟,意味隽永。

总之,新时期侗族作家勤奋笔耕、执著求索,文学的题材、主题、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特征。正如杨志一和过伟先生在《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序》中说的:“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向人民提供了反映我们时代、反映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学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孜孜不倦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灵魂在何处安歇

□杨曦(侗族)

在贵州省黔东南榕江、黎平、从江三县交界的群山中,有条小河从山谷间流过。在河岸边,有个侗族村寨,名叫栽麻。从前的栽麻,天色明净,有如蓝宝石,有一群人,就在这蓝天下生活着。甘露从天降下,河流滋润土地,肥沃的土地生长五谷,村庄在四季的更替中繁衍生息。在从前,栽麻是个传统的侗寨,寨子傍水而建,寨上木楼成片,寨外溪水环绕,花桥横跨溪流上,村寨四周为绿树所环抱。就在这青山秀水的环抱中,在一片起伏连绵的木楼之间,巍峨雄浑的鼓楼伫立山野中,吞吐着大气,人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过着宁静、自由而平和的生活。在一本古老的书上,有这样的诗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恍惚间,让人觉得,这诗句仿佛就是为停息水边的这群人写的。

以前栽麻不通公路,解放后,有县级通往省州的公路主干道从这里经过,于是便有汉人住进来,栽麻渐渐成为汉侗杂居的村寨,现代文明沿公路长驱直入,侗族传统文化由此发生巨大变革。沿河岸旁伸展的这片村庄和田野,在冬日里,显得有些寂静,有些荒凉。然而,当春天临近,春汛到来,犁铧锄头镰刀就再次循着固有的节奏忙碌起来。如今,在每一户用篱笆围着的院子中,在一栋木楼的屋檐下,生活依旧日复一日地延续着,家家户户都过着各不相同的苦辣相伴的生活;寨上一个叫老苦的男子,身上长满毒疮,躺在床上,用瓦片刮去脓疮;卜美珍到寨上听侗歌回来,天黑看不见路,他手脚并用爬过桥来;上寨的老高的妻子跟人跑了,留下一个女孩,后来母亲思念女儿,打电话叫邻居喊女儿接电话,女儿说,她故意丢下我,我不接;一位父亲出去打工,有了新的家庭,回家离婚那天,小男孩哭着跑到山上去,几天没回家;而坳上一位老人,从小跟父亲守庙,已达50余载,但内心有个隐痛,终究难以释怀,一天夜里,老人独自坐在庙里喝酒,酒后放一把火,把庙烧了,自己也被烧死在庙里……在这又艰涩又沉重的生活中,有人长年沉溺在自己的苦难中,几头牛都拉不转,也有人试图重新回到歌声里,在歌声中寻找另一种光辉,寻找灵魂可安歇之处。

栽麻四面环山,无论从哪个山头往下看,都可看到栽麻的形状像一只大船。带着它全部的美丽与苦涩,如今,栽麻这艘大船,正处在传统和现代的剧烈变革中,沉痛、喧闹而混乱,在狭缝中前行着。未来的岁月里,栽麻这艘大船,将驶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只有抬起头来,向上仰望,我们才能知晓答案。

我在栽麻出生,在栽麻长大,栽麻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民族,他们的人和事,他们的灵魂和歌声,永远是我关注的对象,也是我作品表现的主体。

土的那一刹那,心异常柔软,宁静而平和。当心有触动时,持久的神思、感觉、感受,隐秘的念头会涌上心头,随之而来的回忆、感慨、联想等,将构成一系列文字倾泻出来。

爱要出发,爱也要回家。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我说,诗人的返乡,是怀揣灯笼的回归。岑庄和诗歌一样,是我一切情感的烙印。

时间在围绕一只巨大无形的轴心嘎嘎地转动。秋天已经来到,在常人看来本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当我看见妻子在菜园挥舞银锄播下菜种时,我明白:不久菜地又是青翠欲滴,硕果累累。我知道,耕耘是永远的,收获是一定的。

杨仕芳创作谈见7版

民族·身份·创作(六)

走着,写自己的心

□黄松柏(侗族)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地复苏,千帆竞发,一切都从压抑的状态中解放。我从师专中文系毕业,报名去了西藏。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听说西藏很冷,家里给我做了一床10斤重的厚棉被,在棉被的四角,我让弹匠师傅用红色彩棉做了四个字——“四海为家”。这是我人生起点标明的心迹,母亲看着掉泪了。

进西藏,我们走的川藏线,爬过高山还是高山,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头痛,我写下一首诗,它代表了我那一刻的心情:“我要是死了,就在荒野上倒成一具白骨,让有灵魂的屋子,随意联想一部悲壮的故事。我要是死了,就在雪峰挺一尊雪雕,给未来的攀登者,当一面指路的旗帜。”这首诗后来发表在《民族文学》上。

愤怒出诗人,孤独出诗人。到了西藏,我分到一个县城当老师,平时忙的时候,忙得忘了所有。当学生走尽,特别是放寒暑假,整个校园只有我一个人时,无尽的孤独和乡愁时常吞噬我的心。当白雪皑皑铺向远方,当蓝蓝天空一只翱翔的鹰给大地一道弧影,当碧海星空传来一阵阵寺庙的钟声,当那条缓绕的河流穿过视野流进了黄昏……此时,我似乎身处空旷的大漠,“苍天传来隐隐闷语,孩子啊,你是谁”在异乡的孤独催发了我的诗情,《孤独》《剥落的台阶》《寻求》《乡愁》《夜炊》等作品就在那一时期诞生了。这些诗大多发表在《西藏日报》和《西藏文艺》,也收进了我《人生歌谣》的诗集。

我从贵州到西藏高原,又从西藏高原到首都北京。灵魂总在痕迹中适应,又在适应中痕迹。到了大都市,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人生磨砺……这也是寻找家园的过程。我时常忘乎所以地顺着灵魂中的江河,点着星月,执著而沉静地栖居和流连于那梦中的家园。当然,偶尔也有机会真正回到我的家园侗乡的怀抱。于是,在诗歌里,我写在城里的感受,写我的民族和家园。我的身心游走在都市和乡村之间,吟唱着我的家园之歌。

几十年,有点陆游的况味和词境,“位卑未敢忘忧国”。看到村里的地抛荒了着急,写出“共和国把稻穗和麦子刻在国徽上,让粮食的光芒照耀人们躬耕的脊梁”;看到密云水库的水少了焦虑,写出“我的水库瘦了,那些露出的山头,像我母亲枯萎的颧骨,看着我的心由憔悴到痛”;发生地震了,马上漫过悲悯的心情;侗族古寨被火烧了,痛惜得难以言表……遇到这些事,总要动心、动情,总要拿起笔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最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发表了《京华英雄》《黄花顶之骨》等诗文,这都是被抗日英雄们的革命情怀深深感动,不写,放不过自己。创作到现在,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的诗歌价值,我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就这样,我走着,写我的心!